

唐宋誌公神異傳說與 中日十一面、十二面觀音信仰**

楊 明 璋*

摘 要

敦煌文獻中與寶誌有關的寫本、壁畫，有二種類型：一是S.1624、P.3727、S.5600三寫本中敘述寶誌勢面示現觀音相的故事，另一是S.3177、P.3641及莫高窟第395窟甬道南壁有寶誌像，均書寫有〈梁武帝問志公和尚如何修道〉，它們反映的應都是十世紀敦煌的信仰文化。又綜觀中、日各式典籍文獻有關寶誌和尚勢面示現觀音相的傳說，發現存在著顧頡剛所說「層累地造成」的現象。而十二面觀音一開始或附屬於十一面觀音，發展到十世紀，它應已有獨立的信仰體系，且刻意與寶誌勢面化現的故事相結合。

關鍵詞：寶誌、傳說、敦煌、十一面、十二面、觀音

一、前 言

十一面觀音較早的文獻記載為北周耶舍崛多譯《佛說十一面觀世音神咒經》，該書卷一有云：「爾時觀世音菩薩摩訶薩白佛言世尊：若有善男子善女人，有能依觀世音教作法者，彼善男子善女人，須用白旃檀作觀世音像，其木要須精實不得枯篋，身長一尺三寸，作十一頭。當前

2017年4月8日收稿，2017年8月11日修訂完成，2018年2月1日通過刊登。

* 作者係國立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系副教授。

** 本文係據筆者於日本廣島大學「佛教の東漸と西漸國際研究集會」(2016年7月29日)發表之同名論文改寫而成，感謝與會專家學者之指正。

三面作菩薩面，左廂三面作瞋面，右廂三面似菩薩面狗牙上出，後有一面作大笑面，頂上一面作佛面。面悉向前後著光，其十一面各戴花冠，其花冠中各有阿彌陀佛，觀世音左手把澡瓶，瓶口出蓮花，展其右手以串瓔珞施無畏手，其像身須刻出瓔珞莊嚴。」¹ 其後，則有唐代玄奘（602-664）譯《十一面神呪心經》、不空（705-774）譯《十一面觀自在菩薩心密言念誦儀軌經》，以及阿地瞿多譯《陀羅尼集經》卷四也有《十一面觀世音神呪經》，上述三本對於十一面觀音的說解，與耶舍崛多所言，相差無幾。十二面則在唐代慧沼（650-714）為《十一面神呪心經》進行義疏時，有云：「度十二因緣舉十二觀面，……十一面者，前三面慈相見善眾生，而生慈心大慈與樂；左三面瞋面見惡眾生，而生悲心大悲救苦；右三面白牙上出面見淨業者，發希有讚勸進佛道；最後一面暴大笑面見善惡雜穢眾生，而生怪咲改惡向道；頂上佛面或對習行大乘機者，而說諸法究竟佛道故現佛面。各爾三方三面為化三有，故現三面。若合本面應十二面，而十一面是方便面，本體常面是真實面，面離於身，而智面主面，表內懷以顯權實，故常面上現十一面，故曰十一面也。」² 可見十二面與十一面可視為同一概念，二者的差異是十一面加上本面才成為十二面，而舉十二面是為度十二因緣，十一面則是前慈相、左瞋面、右白牙上出面各三，以及後暴大笑面、頂上佛面各一，以分別見善、惡、淨業、善惡雜穢、習行大乘機者，即所謂三十三身現化眾生。³ 研究者謂「十一」在印度是象徵總數的，「三十三」則與《吠陀》、印度教的三十三天有關，具有特殊的象徵意義。⁴

在中土，談到十一面觀音，往往會論及南朝寶誌和尚（418-514）。

1 北周·耶舍崛多譯，《佛說十一面觀世音神呪經》，卷1（CBETA, T20, no. 1070, p. 150, c20, p. 151, a1）。

2 唐·慧沼撰，《十一面神呪心經義疏》，卷1（CBETA, T39, no.1802, p. 1004, b15-c5）。

3 隋·智顗撰，《妙法蓮華經文句》，卷10〈釋觀世音菩薩普門品〉云：「凡有三十三身十九說法。」（CBETA, T34, no. 1718, p. 146, b15-16）又《十一面神呪心經義疏》卷1：「《法華經》曰：『以種種形，遊諸國土，度脫眾生。』故三十三身現化眾生也。」（CBETA, T39, no.1802, p. 1004, c20-22）

4 于君方，《觀音——菩薩中國化的演變》（北京：商務印書館，2012），頁56、60。

學界有關寶誌和尚的研究，最爲人所熟知的莫過於日本學者牧田諦亮，像〈中國における民俗佛教成立の過程〉一文⁵的第二節〈寶誌和尚傳考〉，⁵對寶誌和尚的生平、外在形象、梁武帝對之的崇信、其傳說故事的流傳，以及日本寶誌信仰的傳說等等，都有所考證；〈慈覺大師將來錄より觀たる唐佛教の一面〉一文，⁶則對圓仁入唐時，於今山東所見的寶誌和尚信仰及帶回包括寶誌在內的三聖像，有初步的論述；又〈敦煌本三大師傳について〉一文，⁷則是以敦煌文獻S.1624合抄有僧伽、萬回、寶誌三和尚事跡，探究當時的三聖僧信仰。而于君方在其《觀音——菩薩中國化的演變》一書的第五章〈神異僧與觀音的本土化〉，⁸則利用陸倕〈志法師墓誌銘〉、慧皎《高僧傳》、志磐《佛祖統紀》等等的文獻，考證寶誌與十一面觀音、水陸法會之關係。其他如何劍平〈張僧繇爲寶誌作畫事蹟之考釋〉，指出誌公變化出十二面觀音是唐代密教傳入後的產物，特別是高宗之後有多位皇帝崇信密教；⁹崔小敬〈南朝僧寶誌考略〉也對寶誌生平做了細緻的考證；¹⁰李靜〈寶誌十一面觀音信仰與相關故事產生時間新議〉主要針對何劍平的看法提出反駁，並以爲寶誌化現十一面觀音的故事當是由三個故事的結合，且有其發展進程，首先是在元和年間出現「寶誌斲面」及「張僧繇爲寶誌作畫」二故事，開成年間則出現「寶誌爲十一面觀音」，要到五代宋初才有結合版的「斲面——現十一面觀音——畫不成」一故事。¹¹松本信道的〈寶誌像の日本傳播（一）：大安寺を中心として〉、〈寶誌像の日本傳播（二）：天台入唐・入宋僧を中

5 (日)牧田諦亮著作集編輯委員會，《牧田諦亮著作集》第4卷(京都：臨川書店，2015)，頁207-263。

6 (日)牧田諦亮著作集編輯委員會，《牧田諦亮著作集》第3卷，頁33-47。

7 同上註，頁272-278。

8 于君方，《觀音——菩薩中國化的演變》，頁205-217。

9 何劍平，〈張僧繇爲寶誌作畫事蹟之考釋〉，《華林》第3卷(北京：中華書局，2003)，頁193-204。

10 崔小敬，〈南朝僧寶誌考略〉，《覺群學術論文集》第3輯(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4)，頁417-425。

11 李靜，〈寶誌十一面觀音信仰與相關故事產生時間新議〉，《新國學》2006 (2006.11): 89-107。

心として〉¹² 討論了日本入唐、入宋僧所見的寶誌信仰、作為觀音化身的寶誌，以及寶誌與天台學、禪學之關係。

換言之，寶誌的研究成果甚為可觀，而本論文擬討論的主要論題——寶誌和尚與十一面觀音信仰之關係，前輩學者亦已論及，惟筆者著意關注的是：寶誌和尚勞破面門現出觀音相，致使當時名畫家張僧繇無從繪起的神異傳說，從何時而起？目前，一般以為此一故事的出現與十一面觀音信仰有關，但為何寶誌現出的多是十二面觀音，而非十一面觀音？其中是因時間而有所不同？抑或有其他因素？又寶誌和尚勞破面門現出觀音相的神異傳說，隨著寶誌信仰傳入日本，是以十一面或十二面的形象出現？和中土能否相應？這些都是本文欲探討的。

而要解決這些論題，筆者除了運用學界所熟知的南宋志磐撰的《佛祖統紀》等等傳世文獻外，主要採用的素材是來自敦煌莫高窟藏經洞的文獻，包括有：牧田諦亮已注意過的S.1624，另外還有P.3727，以及S.5600、S.3177、P.3641。

二、敦煌文獻中的誌公

S.1624 及 P.3727 有關寶誌和尚的文書，筆者於〈泗州僧伽和尚神異傳說研究——以敦煌文獻為中心的討論〉一文，¹³ 曾以前輩學者的校錄為基礎略作修正，¹⁴ 今彙錄如下：

謹按《三寶感通錄》曰：宋末沙門寶志（誌）者，遊於楊（揚）州。擎杖每懸剪刀、尺拂（拂）。人家供敬，分形赴齋。尋隱鍾山，百獸銜花，巖神獻果。梁武帝遣使并寶輦，入山遠迎，請入內殿道場供養。因詣賢

12 〈日〉松本信道，〈寶誌像の日本傳播（一）：大安寺を中心として〉，《駒澤大學文學部研究紀要》64(2006.3): 27-45；〈寶誌像の日本傳播（二）：天台入唐・入宋僧を中心として〉，《駒澤大學文學部研究紀要》65(2007.3): 1-12。

13 楊明璋，〈泗州僧伽和尚神異傳說研究——以敦煌文獻為中心的討論〉，《中國學術年刊》39(春季號，2017.3): 51-76。

14 S.1624 據方廣錫，〈敦煌遺書中寫本的特異性——寫本學劄記〉，《敦煌吐魯番研究》14(2014.12): 181-192；P.3727 則據鍾書林、張磊，《敦煌文研究與校注》（武漢：武漢大學出版社，2014），頁 649。

聖者僧寶意處，見供奉張僧謠（繇）邈真，和尚曰：「可與吾寫真否？」僧謠（繇）下筆。和尚或（惑）其形貌，莫能得定。僧謠（繇）變容誣言，和尚乃以爪釐（勞）面，開示十二面觀音菩薩形相，僧謠（繇）乃哀求懺悔。却復本形，重歸大內，且化緣畢，辭帝，歸鍾山入滅矣。昔泗州大師到此土存歿，三十六化，具載傳記，福利昭彰，今日當時，慈悲不替，觀真容而福至，聞尊號以災消。（S.1624）

聖者泗州僧伽和尚元念因緣

昔僧伽和尚者，化迹之邦，現身百顙，弋甲莫侵，端然而定，或朝變人相，或夜現佛儀，度昔眾生，令歸彼岸。有人崇重，當獲良緣，若有拒惡，不發恙怒，凡人莫測，數作奇真。因茲誠實，人發勝心，海內清平，殄除災（災）沴。若有修造繪聖模真者，無願不遂，更有靈應別錄傳文，奉勸至心敬禮。渴仰聖者，求願滿足，隨願現種種身，或示大身，側塞遍滿虛空，變小身，由（猶）如微塵，不可稱、不可量，不〔可〕論、不可說。大慈大悲智（誌）公和尚真影，張僧謠（繇）邈此和尚真影時。（P.3727）

二則都敘及寶誌和尚、僧伽和尚，只是前者的主角是寶誌，後者的主角則為僧伽。而後者約略敘及的寶誌之事，其實就是前者敘述的主軸——寶誌勞破面門，現示十二面觀音相。筆者曾將S.1624 有關寶誌的敘事與《大正藏》所收道宣撰《集神州三寶感通錄》逐一對照，發現二者的文句確有部分近同，¹⁵惟《大正藏》本未敘及寶誌勞破面門，也未有張僧繇為寶誌邈真之事，故S.1624 所說的《三寶感通錄》是否就是道宣於麟德元年（664）撰成的《集神州三寶感通錄》，¹⁶仍有待進一步考證。

接下來，要介紹的是S.5600（附錄一）。¹⁷此一寫本為冊葉本，《敦煌遺書總目索引新編》擬有四題，包括：〈八萬四千法門、八相解釋〉、〈張僧繇為志弘和尚畫像事〉、〈悉達太子成道俗文〉、〈優婆離出家事〉。事實上，S.5600 所抄為諸種佛教人事雜抄，計有二十七條，如下：

1. 八萬四千法門者
2. 世尊八相成道八相者
3. 又云十相成道十者

15 楊明璋，〈泗州僧伽和尚神異傳說研究——以敦煌文獻為中心的討論〉，《中國學術年刊》39（春季號，2017.3）：51-76。

16 唐·道宣撰，《集神州三寶感通錄》（CBETA, T52, no. 2106, p. 423, a17）。

17 The International Dunhuang Project: The Silk Road Online, <http://idp.bl.uk/>（2017.8.13 上網檢索）。

4. 阿難偈云
5. 《俱舍論》云
6. 魔女偈云
7. 仏偈云
8. 唐時有功師張僧繇（繇）
9. 受胎有三品
10. 羅睺羅者
11. 又耶輸陀羅六年胎孕者
12. 言賢劫者
13. 優波離者
14. 神龜攢卦能定吉凶，加葉智明能知三世
15. 目連者
16. 訟云如此賢劫
17. 无明障眞見者……
18. 三二七雜染
19. 經苦離難而不改其節日行也……
20. 梵語者……
21. 五天境……
22. 十八界三界何界无……
23. 四州者
24. 无煩天者
25. 閻浮壇金者
26. 竭師羅長者
27. 无雲天滅三劫者其義云何

它們或有所本，如編號 5.「《俱舍論》云：汙母无學尼，煞住定菩薩，及有學聖人，奪僧和合緣，破壞牽緒波，是无間同類業。」應當出自玄奘譯《阿毘達磨俱舍論》卷十八〈分別業品〉，其中有頌曰：「汚母無學尼，殺住定菩薩，及有學聖者，奪僧和合緣，破壞牽堵波，是无間同類。」¹⁸二者僅若干文字略異。又編號 4.「阿難偈云：名標起願之初，身居得道之夜，面如滿月，目類青蓮，能令見者悅神，父王覩之歡喜，故云歡喜已。」則與 P.2049《維摩經疏》卷第三〈弟子品〉相當，經疏云：「故淨法師云：阿難者，是佛昆季，宿著因緣，名標起願之初，生居得道之末，面如滿月，目類青蓮，能令見悅神，亦使父王慶集，具斯三義，故稱歡

18 唐·玄奘譯，《阿毘達磨俱舍論》，卷 18〈分別業品〉（CBETA, T29, no. 1558, p. 94, b22-25）。

喜。」經疏中的淨法師即是紀國寺慧淨法師（578-645）。¹⁹唐文宗大和年間（827-835）僧人栖復集《法華經玄贊要集》卷七也有近同的文句，云：「言一云慶喜者，名標起願之初，生乎得道之夜，面如滿月，目類青蓮，能令見者悅神，亦使大王歡喜，故名慶喜。」²⁰

又如編號15.「目連者，此云：採菽採菽（采菽采菽）者，胡豆之名，其上祖好食其豆，因豆立名。名云羅附，此先代好食羅蔔，因以目連立名。」此則交代了目連及羅附之名的由來。隋代智顗撰《妙法蓮華經文句》卷1〈序品〉云：「大目犍連，姓也，翻『讚誦』，《文殊問經》翻『萊茯根』。《真諦》云『勿伽羅』，此翻『胡豆』。二物古仙所嗜，因以命族。」²¹因古仙嗜某物，故以某物為名，和S.5600所說的是同一種思維。類似的說法又可見於唐代窺基撰《阿彌陀經疏》卷一，有云：「《文殊問經》云『大目犍連』，此云『蘿茯根』，其父好噉，因物為名，若《涅槃經》云『目犍連』。是姓與《過去因果經》同。此云『讚誦』，字『拘律陀』，因接拘律陀樹而生，故《真諦》云『應名勿伽羅』。此云『愛胡豆』，愛胡豆，即菉豆也。上古有仙人唯食此豆，是彼仙種因姓為名。」²²或據傳窺基撰《阿彌陀經通贊疏》卷一也有云：「梵云『摩訶沒特伽羅』，言『大目犍連』者，訛也。『摩訶沒特伽羅』，此云『大採菽氏』。上古有仙居山寂處，常採菉荳而食，因以為姓，尊者之母是彼之族也。取母氏姓而與立名，得大神通，揀餘卑姓，故復云『大採菽氏』。」²³

至於編號8.，有云：

唐時有功師名張僧岳（繇）善畫，有一僧名志弘（公）。其僧岳（繇）正畫次，志弘（公）師變為一小師，至彼畫處語僧岳（繇）云：「先生與畫我身。」其僧岳（繇）便畫之，一變畫時或方，一變或長，一變或斜，

19 唐·栖復集，《法華經玄贊要集》，卷6：「言淨法師者。紀國慧淨法師也。」（CBETA, X34, no. 638, p. 308, b23//Z1:53, p. 310, b3//R53, p. 619, b3）。

20 唐·栖復集，《法華經玄贊要集》，卷7（CBETA, X34, no. 638, p. 327, a8-10//Z 1:53, p. 328, c16-18 //R53, p. 656, a16-18）。

21 隋·智顗撰，《妙法蓮華經文句》，卷1〈序品〉（CBETA, T34, no.1718, p. 13, b26-28）。

22 唐·窺基撰，《阿彌陀經疏》，卷1（CBETA, T37, no. 1757, p. 315, c12-18）。

23 唐·窺基撰，《阿彌陀經通贊疏》，卷1（CBETA, T37, no. 1758, p. 334, a26-b2）。

如是數變，畫之不得，僧岳（繇）惡發語志弘（公）云：「今日我不及畫，明日畫之。」志弘（公）報曰：「汝不遮今日，明日更畫，劫已來，畫我不得。」僧岳（繇）莫知所以，志弘（公）云：「汝從毗婆尸佛已來，常時好畫，曾聞說十一面觀世音菩薩否？」僧岳（繇）云：「不聞。」「汝今看之。」其志弘（公）以甲指當自面上獲之，內有十一面觀世音菩薩端然而現歡，令捨畫。此菩薩因此而有也。

文中謂「唐時有功師張僧繇」，當是指南朝名畫家張僧繇，寫本交代的時代與名字均有訛誤，不過，我們也得以推斷敦煌此文書書寫的時代不會是唐代，而應是出自五代宋初的書手所為。且其謂找張僧繇畫像的僧人，名為「志弘」，「弘」當是「公」字的形近而訛。也就是說，這亦是一則敘述寶誌和尚勞面示現觀音相的文本，只是它提到的觀音不同於 S.1624 的十二面，而是十一面，特別值得注意的，是文末謂「此菩薩因此而有也」，顯然此則敘述寶誌勞面，為的是用以解釋十一面觀音的由來。

至於 S.3177 及 P.3641 均抄有〈梁武帝問志公和尚如何修道〉。S.3177 共有十三行，略殘數字，首行謂：「梁武帝問志公和尚如何修道 和尚以偈□□」。而 P.3641 則凡有二十三行：第一至十行，抄寫的是「梁武帝問志公和尚如何修道」；第十至十四行，抄寫的則是「无著和尚親遊五臺見文殊菩薩」，主要是文殊化現的老人及童子君提的偈語；第十四至廿三行，抄寫的是「草堂和尚說偈」，以「誰家觀世音，救你僂倖漢」作結。其中的無著（737-836）與君提的偈語，在許多典籍中亦有之，較早的如贊寧於宋太宗端拱元年（988）撰成的《宋高僧傳》，²⁴ 或延一於宋仁宗嘉祐五年（1060）編集成的《廣清涼傳》均可見，如此一來，P.3641 的抄寫年代不可能早於八世紀下半葉，且綜觀敦煌文獻主要的抄寫年代，P.3641 的抄寫應該和《宋高僧傳》的年代相當。而莫高窟第 395 窟有曹氏歸義軍前期畫一僧人像，像雖殘，²⁵ 但伯希和（Paul Pelliot, 1878-1945）1908 年留下的《敦煌石窟筆記》有云：「（伯希和編號第 147a 號洞）過

24 贊寧自太平興國七年始撰集《宋高僧傳》，端拱元年（988）撰成。參見宋·贊寧撰，《宋高僧傳》（北京：中華書局，1997），〈進《高僧傳》表〉，頁 1。

25 張小剛云：「莫高窟第 395 窟（希伯和編號第 147a 號洞）甬道南壁曹氏歸義軍前期畫一僧人像，像已殘，現存山巒與一鹿。20 世紀初伯希和考察隊曾拍攝了該畫像的照片，可參見伯希和《敦煌石窟圖錄》第 6 冊圖版 PL.CCCXX III（圖 3-3-10）。畫面上—老齡僧人，頭披風帽，身著袈裟，長鬚，左手持杖，杖頭掛有葫蘆等物。……關

道左壁的漢文題識具有教理特徵，以下面這樣的一段文字結束：『蕭梁武帝問志（？）公（？）和尚如何修道和尚以偈答。』這裡可能就是該和尚的畫像。²⁶從伯希和筆記，可知寶誌和尚曾被繪於石窟壁畫上為人所膜拜，而畫旁的題識正好就是S.3177、P.3641所抄的〈梁武帝問志公和尚如何修道〉。這三種文獻，雖未提及觀音菩薩，但它們終究說明了寶誌和尚在當時是受到佛教信眾的崇信，才會再三地抄錄其偈語。

至於S.1624、P.3727、S.5600、S.3177、P.3641等五個寫本，因均未見有紀年題記，故難以知曉其確切的抄寫年代，僅S.1624應是天福七年（942）前後抄寫的，²⁷而各本抄寫年代最晚也不會晚於1002年。²⁸加上畫於莫高窟第395窟甬道南壁的寶誌和尚像，為曹氏歸義軍前期的畫作，故整體來看，上述這些敦煌文獻反映的應該就是十世紀的寶誌和尚崇拜。

三、唐宋時期中土十一面、十二面觀音與誌公神異傳說

從陸倕（470-526）〈誌法師墓誌銘〉開始，寶誌的傳記事跡即不時可見神異敘事充斥其中，如陸倕云：

法師自說姓朱，名保誌，其生緣，桑梓莫能知之。齊故特進吳人張緒、興皇寺僧釋法義，並見法師，於宋太始（467-471）初，出入鍾山，往來都邑，年可五六十歲，未知其異也。齊宋之交，稍顯靈迹，被髮徒跣，負杖挾鏡，或徵索酒肴，或數日不食，豫言未兆，懸識他心，一時之中，

於此畫像，日本松本榮一氏曾有專文考證，認為畫面中的僧人是中國南朝時期的寶誌和尚，筆者基本同意這個說法。……P.3641匯集了寶誌和尚……其中寶誌和尚答梁武帝關於如何修道的偈言與敦煌遺書S.3177所記文字大致相同。……S.3177首行作……這與伯希和在莫高窟第窟所摘錄的一句題記完全相同。」張小剛，《敦煌佛教感通畫研究》（蘭州：甘肅教育出版社，2015），頁265-267。

26 (法)伯希和(Paul Pelliot)著，耿昇譯，《伯希和敦煌石窟筆記》（蘭州：甘肅人民出版社，2007），頁338。

27 郝春文、趙貞編著，《英藏敦煌社會歷史文獻釋錄》第7卷（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0），頁375。

28 敦煌文獻目前可見最晚的紀年題記為Φ32〈曹宗壽造經帙疏〉——「大宋咸平五年（1002）壬寅歲五月十五日記」。見（俄）孟列夫主編，袁席箴、陳華平譯，《俄藏敦煌漢文寫卷敘錄》（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頁681。

分身數處。天監十三年（514），即化於華林園之佛堂，先是忽移寺之金剛像出置戶外，語僧眾云：「菩薩當去。」爾後旬日，無疾而殞。²⁹

所謂「數日不食，豫言未兆，懸識他心，一時之中，分身數處」，即是其神異能力的簡要表述，又圓寂前語僧眾：「菩薩當去」，可見寶誌在世時，即被視為菩薩。而稍後的慧皎（497-554），於其《高僧傳》卷10則有：「有陳御³⁰虜者，舉家事誌甚篤。誌嘗為其現真形，光相如菩薩像焉。」³¹寶誌在此，更進一步地直接化現成菩薩，只是尚未有劈破面門現觀音之舉。而目前隱約對寶誌劈破面門現觀音一神異事跡有所敘述的最早記錄，是盛、中唐幾位詩人的詩讚，如李白（701-762）〈誌公畫讚〉：「水中之月，了不可取。虛空其心，寥廓無主。錦幪鳥爪，獨行絕侶。刀齊尺量，扇迷陳語。丹青聖容，何住何所。」³²末二句謂寶誌的聖容是無所住的，應當就是寶誌可變化多種形容的詩化表述。又如皎然（730-799）〈誌公贊〉：「大動之地，我安其中。高景無氛，靈鶴在空。出生死阨，隨物有終。楞形駭俗，借續開蒙。常攜刀尺，精意誰通。」³³所謂的「楞形駭俗，借續開蒙」，指的應當分別為劈破面門以現觀音，以及不斷變容下名畫家張僧繇也無法為其繪像。之後，大曆年間（766-779）的寒山，³⁴有一詩作：「余見僧繇性希奇，巧妙間生梁朝時。道子飄然為殊特，二公善繪手毫揮。逞畫圖真意氣異，龍行鬼走神巍巍。饒邈虛空寫塵跡，無因畫得志公師。」³⁵或元稹（779-831）約作於元和十三年（818）的〈和樂天尋郭道士不遇〉，³⁶詩云：「昔年我見杯中渡，今日人言鶴上逢。兩虎定隨千歲

29 唐·歐陽詢撰，《藝文類聚》（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卷77〈內典下·寺碑〉，頁1322。

30 湯用彤校注有云：「三本、金陵本、《珠林》『御』作『征』。」見南朝梁·慧皎撰，湯用彤校注，《高僧傳》（北京：中華書局，1997），卷10，頁398。

31 南朝梁·慧皎撰，湯用彤校注，《高僧傳》，卷10，頁397。

32 清·董皓等編，《全唐文》（北京：中華書局，1987），卷350，頁3544。

33 同上註，卷917，頁9555。

34 參唐·寒山撰，項楚注，《寒山詩注》（北京：中華書局，2000），前言，頁2-3。

35 同上註，頁497。

36 朱金城《白居易年譜》將白居易〈尋郭道士不遇〉繫於元和十三年，故元稹和作當也在此時或稍後。見朱金城，《白居易年譜》（臺北：文史哲出版社，1991），頁91。

鹿，雙林添作幾株松。方瞳應是新燒藥，短腳知緣舊施春。欲請僧繇遠相畫，苦愁頻變本形容。」³⁷ 均是針對張僧繇面對誌公頻變形容無從下筆所做的歌詠。可見至少從八世紀開始，唐土應該就有誌公劈破面門現觀音相的故事流傳著，只是因為這些文本是以抒情為主的詩讚形式來表現，故事的情節僅隱約可見，未有詳述。

唐代神清(?-820)於元和元年(806)撰、宋初慧寶注的《北山錄》，³⁸ 應該是直言寶誌現觀音相較早且交代較詩讚為詳盡的文本，其卷三有云：「梁初其迹孔盛，有陳征虜悉家事誌，誌為現真形，光相如菩薩像焉。有以觀音為誌，今或建之也(注：即今十一面觀音也)。」³⁹ 雖然現十一面觀音是宋初慧寶的推想，但已初步將寶誌與觀音菩薩連結在一起。而這樣的說法，也可見於時間稍後的李顧行於長慶四年(824)受贊皇公李瑀(785-853)之託所作的〈上元縣開善寺修誌公和尚堂石柱記〉，其中有云：「誌公和尚者，實觀音大士之分形者歟，然跡見於近代，《梁書》具載其事。」⁴⁰ 二文本的年代和上述詩讚，尤其是元稹詩相當，將它們各自敘述的片斷情節統合起來，即是誌公劈破面門現觀音相令僧繇無以作畫，再次說明了這樣的神異故事，確實在八世紀已流傳開來。之後，日僧圓仁(794-864)於開成五年(840)四月六日至登州醴泉寺禮拜安置在琉璃殿內的誌公和上影，並謂「誌公和上是十一面菩薩之化身」，⁴¹ 這是首次明確交代寶誌和尚為十一面菩薩的化身。而前節討論過大約抄寫於十世紀前半葉的敦煌寫本——S.5600、S.1624，敘述寶誌劈面變化十一面或十二面觀音令張僧繇無以作畫，其詳盡可說是前所未見的。

一般傳世文獻則要到南宋祖琇(約1163、1164時人)撰《隆興編年通論》才有，該書卷6云：

37 唐·元稹撰，《元稹集》(北京：中華書局，2000)，卷21，頁235。

38 昌彼得謂慧寶當為宋初人。見昌彼得，《增訂蟬菴羣書題識》(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97)，頁230。

39 唐·神清撰，宋·慧寶注，《北山錄》，卷3(CBETA, T52, no. 2113, p. 592, c2-4)。

40 宋·李昉等奉勅編，《文苑英華》(北京：中華書局，1966)，卷820〈釋氏四〉，頁4331-4332。

41 (日)圓仁撰，白化文、李鼎霞、許德楠校注，《入唐求法巡禮行記校注》(石家莊：花山文藝出版社，2007)，卷3，頁245-246。

天監二年，武帝詔曰：「大士寶誌迹拘塵垢，神游冥寂，水火不能焦濡，蛇虎不能侵懼，語其佛理則聲聞以上，談其隱淪則遁僊高者，豈可以俗法常情空相疑忌，自今中外任便宣化。」帝一日問誌曰：「弟子煩惑未除，何以治之？」答曰：「十二。」帝問：「其旨云何？」答曰：「在畫字時節刻漏中。」帝益不曉。……嘗詔畫工張僧繇寫誌像，僧繇下筆，輒不自定，既而以指釐面門，分披出十二面觀音，妙相殊麗，或慈或威，僧繇竟不能寫。⁴²

南宋典籍中，類似的記載還有本覺（約 1265 至 1274 時人）所編集的《釋氏通鑑》，該書卷五云：「戊子（天監七年），詔畫工張僧繇，寫寶公像，誌勞面門，出十二面觀音相，或慈或威，僧繇竟不能寫。」⁴³ 以及成書於咸淳五年（1269）志磬（1218-1278）所撰的《佛祖統紀》，該書卷三十六云：「（齊高帝建元）四年，詔沙門法穎為京邑僧主。詔迎皖山誌公入京，公勞其面為十二面觀音，帝以其惑眾惡之。」同書卷三十七：「（天監）二年，帝問誌公：『國有難否？』……嘗詔張僧繇寫誌真，誌以指勞破面門，出十二面觀音相，或慈或威，僧繇竟不能寫。」⁴⁴ 另外，美國 Museum of Fine Arts, Boston 收藏有一幅南宋周季常於淳熙五年（1178）所繪的《五百羅漢圖軸：應身觀音》，⁴⁵ 圖中即畫有寶誌勞面現觀音相，左手作勢勞菩薩相，下巴已露出與雙手、頸項相同的黝黑顏色，頂上另有三層菩薩相——四面、三面、一面，其前及右側共有僧、俗九位，其中有一位手執筆，一位手拿紙，作交談狀，應當是在表現張僧繇見寶誌變相無從下筆。這些都說明了寶誌勞面現觀音相令僧繇無以作畫，在南宋時仍廣泛流傳著。

雖然北宋初至南宋初，即十世紀末至十二世紀上半葉，各式傳世典籍未見有寶誌勞面變化十一面或十二面觀音相令僧繇無以作畫的敘述，但誌公變十二面觀音的事跡早已成為這段時期為中土人們所熟知的主

42 宋·祖琇撰，《隆興編年通論》，卷 6（CBETA, X75, no. 1512, p. 140, b5-18//Z 2B:3, p. 243, a5-18 //R130, p. 485, a5-18）。

43 宋·本覺編，《釋氏通鑑》，卷 5（CBETA, X76, no. 1516, p. 48, c15-19//Z2B:4, p. 418, d3-7//R131, p. 836, b3-7）。

44 宋·志磬撰，《佛祖統紀》，卷 36（CBETA, T49, no. 2035, p. 346, c7-20, p348, b18-c7）。

45 Museum of Fine Arts, Boston, <http://www.mfa.org/collections/object/lohan-manifesting-himself-as-an-eleven-headed-guanyin-24230>（2017.8.13 上網檢索）。

題，如約成書於嘉祐年間（1056-1063）的北宋劉道醇撰《宋朝名畫評》卷一云：「王道真，字幹叔，新繁人，幼穎悟有節操，善丹青，太宗朝待詔高文進甚有聲望，一日上問：『民間誰如卿者？』文進對曰：『新繁人王道真者，猶出臣上。』遂召入圖畫院祇候，與文進等傳移相國寺高益畫壁，及於大殿西偏門南面東壁畫寶誌化十二面觀音相，數與文進對畫寺庭北門東面大神。遷待詔，及同文進畫玉清昭應宮壁，當時稱之。」⁴⁶又約成書於北宋熙寧七年（1074）的郭若虛撰《圖畫見聞志》卷三云：「王道真，蜀郡新繁人，工畫佛道人物，兼長屋木。太宗朝用高文進薦引，授圖畫院祇候，嘗被旨畫相國寺并玉清昭應宮壁。今相國寺殿東畫給孤獨長者買祇陀太子園因緣，并殿西畫誌公變十二面觀音像，其蹟竝存。」⁴⁷又同書卷六：「治平乙巳歲（1065），雨患，大相國寺以汴河勢高，溝渠失治，寺庭四廊悉遭滄浸，圯塌殆盡，其牆壁皆高文進等畫，惟大殿東西走馬廊相對門廡不能為害，東門之南王道真畫給孤獨長者買祇陀太子園因緣，東門之北李用及與李象坤合畫牢度叉鬪聖變相，西門之南王道真畫誌公變十二面觀音像，西門之北高文進畫大降魔變相，今竝存之，皆奇蹟也。」⁴⁸這三則記載所說的，正好都是汴京相國寺寺壁留存的王道真畫誌公變十二面觀音像。北宋惠洪（1071-1128）所撰的《石門文字禪》卷十八〈漣水觀音畫像贊并序〉則說道：「大觀四年（1110）春二月，戊子之夕，病，比丘德洪纍然臥縲紲之中，夢至一處，庭宇闐然，有僧導入室中，舉燭視壁間，有鍾山寶公菩薩之像，意欣然，欲得之而像輒自墮手中，復展視之，則化為十二面觀音慈嚴之相，心大驚異，遂覺。已三鼓矣。」⁴⁹又南北宋之際的紹隆（1077-1136）等編《圓悟佛果禪師語錄》卷五：「師乃云：『當年此日大悲生，千臂莊嚴千眼明。

46 宋·劉道醇撰，《宋朝名畫評》（清文淵閣四庫全書本，「中國基本古籍庫」），卷1〈人物第一〉，「王道真」條。

47 宋·郭若虛撰，《圖畫見聞志》（明津逮秘書本，「中國基本古籍庫」），卷3〈紀藝中〉。

48 同上註，卷6〈近事〉，「相國寺」條。

49 宋·惠洪撰，《石門文字禪》（四部叢刊景明徑山寺本，「中國基本古籍庫」），卷18〈漣水觀音畫像贊并序〉。

世出世間殊勝事，神通無不總圓成。恁麼去，步步踏佛階梯；恁麼來，處處現身現土。於六根得深圓通，於解脫得普門智，所以無刹不現，無處不真。或爲寶公十二面，或作達磨傳心印，或向泗洲運神通，或向香山發妙身，周旋往返。」⁵⁰顯然寶誌是許多佛教徒崇拜的對象，而寶誌化爲十二面觀音也是當時人們所熟悉的故事，才會成爲寺院壁畫的主題，以及夢想與修道渴望達至的勝境。

綜觀各式典籍文獻有關寶誌和尚勞面示現觀音相令僧繇無以作畫的記載，發現它確實有如顧頡剛所提出：中國上古史及神話譜系化的形成過程，存在著「層累地造成」規律——「時代愈後，傳說中的中心人物愈放愈大」⁵¹的情形。南朝時，僅言寶誌化現爲菩薩，並未言明是觀音菩薩，至八至九世紀初始言化現爲觀音，且應該在此時就出現了藉勞面示現觀音相令僧繇無以作畫的生動故事。九世紀中葉才出現有寶誌是十一面觀音的化身，十世紀上半葉又有十二面觀音之說，而十一世紀開始，提到寶誌和尚示現觀音相都是十二面，不再出現十一面，寶誌儼然成爲十二面觀音的代名詞。

當然，也有其他高僧被視爲十一面或十二面觀音，如 988 年撰成的《宋高僧傳》卷十八有〈唐泗州普光王寺僧伽傳〉，云：「嘗臥賀跋氏家，身忽長其床榻各三尺許，莫不驚怪，次現十一面觀音形，其家舉族欣慶倍加信重，遂捨宅焉，其香積寺基，即今寺是也。」⁵²又如南宋施宿（1164-

50 宋·紹隆等編，《圓悟佛果禪師語錄》，卷 5（CBETA, T47, no. 1997, p. 736, b16-22）。

51 顧頡剛，〈與錢玄同先生論古史書〉，《古史辨》第 1 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頁 60-65。

52 宋·贊寧撰，《宋高僧傳》，卷 18〈唐泗州普光王寺僧伽傳〉（CBETA, T50, no. 2061, p. 822, a15-18）。按：北宋黃庭堅於元豐六年癸亥（1083）所作的〈題神移仁壽塔〉，有「十二觀音無正面」之句，而南宋史容（1147-1217）則注云：「僧伽至臨淮，嘗臥賀跋氏家，現十二面觀音形，其家欣慶，遂捨宅焉，即今寺也。見《宋僧傳》。問十二面觀音阿那面正，見《傳燈錄·義玄禪師傳》。」史容顯然是引述《宋高僧傳》的文字，但卻作「十二面觀音」，不知是為符合黃庭堅詩句有意識的更動，或者是抄寫、版刻過程無意識的訛誤。以上分見宋·黃蓍，《山谷年譜》（清文淵閣四庫全書本，「中國基本古籍庫」），卷 17；宋·黃庭堅撰，宋·史容注，《山谷外集詩注》（四部叢刊景元刊本，「中國基本古籍庫」），卷 14〈題神移仁壽塔〉。

1222)撰《(嘉泰)會稽志》卷七〈山陰縣〉,云:「天衣寺在縣南三十里,晉義熙十三年(417)僧曇翼結庵,誦《法華經》,多靈異,內史孟凱請置法華寺。至梁,惠舉禪師亦隱此山,武帝徵之,不至。有翼公所頂戴紫檀十二面觀音,及梁昭明太子遺舉公金縷木蘭袈裟、紅銀藻瓶、紅銀瑠璃鉢,至今具在。」⁵³僧伽、曇翼二位高僧縱然與十一面或十二面觀音有所連結,但僅是在若干典籍偶然的出現,不像寶誌化現十一面或十二面觀音流傳那麼普遍及久遠。

四、唐宋時期日本十一面、十二面觀音與誌公神異傳說

日本現存的漢文典籍文獻中,可見寶誌和尚最早的記載,是鑑真和尚(688-763)的弟子思託於日本延曆七年(788)撰成的《延曆僧錄》,其中〈智名僧沙門釋戒明傳〉載有日本奈良大安寺戒明在寶龜年間(770-780)入唐訪金陵之見聞:「復禮拜誌公宅,兼請得誌公十一面觀音菩薩真身還聖朝,於大安寺南塔院中堂素影供養。」⁵⁴七、八十年後的西元840年,前文曾引述過同是日僧的圓仁,在登州醴泉寺琉璃殿也見到誌公影,並耳聞誌公是十一面菩薩化身,同時也從長安寺院求得「壇龕僧伽誌公邁⁵⁵迴三聖像(一合)」請回日本。⁵⁶日本僧人安然(841?-915?)於日本元慶九年(885)據叡山最澄、圓仁、圓珍等八位和尚的目錄分部別類所完成的《諸阿闍梨真言密教部類總錄》一書,⁵⁷其卷下〈諸圖像部〉「諸

53 宋·施宿撰,《(嘉泰)會稽志》(清文淵閣四庫全書本,「中國基本古籍庫」),卷7〈山陰縣〉。

54 見日本東大寺宗性於建長三年(1251)編撰《日本高僧傳要文抄》第三引《延曆僧錄》第五。轉引自(日)松本信道,〈『延曆僧錄』戒明傳の史料的特質〉,《駒沢史學》37(1987.11): 31-46。

55 「邁迴」應當就是「萬回」和尚。

56 (日)圓仁撰,《入唐新求聖教目錄》,卷1(CBETA, T55, no. 2167, p. 1084, c18)。

57 (日)安然撰,《諸阿闍梨真言密教部類總錄》(CBETA, T55, no. 2176, p. 1113, b26-c10)。

聖僧影」條也有「壇龕僧伽誌公乃⁵⁸迴三聖像一合(仁)」,⁵⁹末尾標有「仁」字,顯然是根據圓仁目錄,也意味著經過四十餘年後,日本的誌公信仰與崇拜仍在。除此之外,入唐僧惠運(798-869)和圓珍(814-891)也從中土帶回寶誌和尚的作品,且在九世紀日本的上階層流傳著,如惠運於日本承和十四年(847)⁶⁰撰就的《惠運禪師將來教法目錄》有「志公歌一卷」,⁶¹又治部卿源朝於日本應和三年(963)令延光朝臣奏安祥寺進真言目錄御寫一本——《惠運律師書目錄》中,⁶²也有「梁朝志公和尚歌一卷」。⁶³圓珍(814-891)於唐大中十一年(857)⁶⁴撰成的《日本比丘圓珍入唐求法目錄》有「梁朝志公歌一卷」,⁶⁵又圓珍於日本天安三年(859)謹送上太政大閣下用以「結來緣」⁶⁶的《智證大師請來目錄》,也有「梁朝志公歌一卷」。⁶⁷

而這樣的風氣,來到十一世紀猶未停歇。像入宋僧成尋(1011-1081)在熙寧五年(1072)來到開封七客院禮七寶無價塔,並於塔前見「坐梁朝誌公和尚等身像,瘦黑比丘形,著紫袈裟衫裙,舉袖見手,骨露現瘦」,成尋還特別對誌公身像禮拜、燒香。⁶⁸不過,上述文獻尚未出現對寶誌和尚勞面示現觀音相令僧繇無以作畫的具體敘述,要到十三世紀上半葉的《宇治拾遺物語》才有之,該書卷九有〈宝志和尚影の事〉,云:

昔、唐に宝志和尚といふ聖あり。いみじく貴くおほしければ、御門、

58 「乃迴」應該是「万回」。

59 (日)安然撰,《諸阿闍梨真言密教部類總錄》(CBETA, T55, no. 2176, p. 1132, a29-b5)。

60 (日)惠運撰,《惠運禪師將來教法目錄》(CBETA, T55, no. 2168A, p. 1089, a16)。

61 同上註, (CBETA, T55, no. 2168A, p. 1089, a5)。

62 (日)惠運撰,《惠運律師書目錄》(CBETA, T55, no. 2168B, p. 1092, a2-4)。

63 同上註, (CBETA, T55, no. 2168B, p. 1091, c12)。

64 (日)圓珍撰,《日本比丘圓珍入唐求法目錄》(CBETA, T55, no. 2172, p. 1101, c25)。

65 同上註, (CBETA, T55, no. 2172, p. 1100, c21)。

66 (日)圓珍撰,《智證大師請來目錄》(CBETA, T55, no. 2173, p. 1108, a1-2)。

67 同上註, (CBETA, T55, no. 2173, p. 1106, b18)。

68 (日)成尋撰,王麗萍校點,《新校參天台五台山記》(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9), 卷4, 頁346-347。

「かの聖の姿を影に書きとらん」とて、絵師三人を遣はして、「もし一人してしくは、書き違ゆる事もあり」とて、三人して面々に写すべき由仰せ含められて、遣はさせ給ふに、三人の絵師聖のもとへ参りて、かく宣旨を蒙りてまうでたる由申しければ、「しばし」といひて、法服の装束して出であひ給へるを、三人の絵師、おのおの書くべき絹を広げて、三人並びて筆を下さんとするに、聖、「しばらく。我がまことの影あり。それを見て書き写すべし」とありければ、絵師左右なく書かずして聖の御顔を見れば、大指の爪にて額の皮をさし切りて、皮を左右へ引き退けてあるより、り、金色の菩薩の顔をさし出でたり。一人の絵師は十一面觀音と見る。一人の絵師は聖觀音と拝み奉りける。おのおの見るまにに写し奉りて持ちて参りたりければ、御門驚き給ひて、別の使を給ひて問はせ給ふに、かい消つやうにして失せ給ひぬ。（筆者按：「只見聖者用其拇指の指甲將額前的皮膚割裂，並向左右褪去皮膚，在割裂處出現了黃金色的菩薩面容。其中一位繪師看見十一面觀音，另一位則見到聖觀音。他們各將所見分別記錄下來，之後向上呈給皇帝，皇帝見他們所繪各有不同，大為吃驚，立刻命人去尋找聖者，但聖者一轉眼已如雲煙消散。」）それよりぞ「ただ人にてはおはせざりけり」と申し合へりける。⁶⁹

文中寶誌仍是以指爪劈面，且一樣有畫師爲寶誌寫真，只是張僧繇未於故事出現，而是以三位不知名畫師取代，謂每一位畫師所見所畫不同，或見金色菩薩，或見十一面觀音，或見聖觀音，可說是中土寶誌劈面現觀音相故事的變異。與此甚爲近似的情節，是一篇據稱是建武中興（1333-1336）前後名爲〈寶誌和尚傳〉的篇章，牧田諦亮對其來由有清楚的交代：「金沢称名寺で大に經論書写につとめた熙允の手沢本であつて、左は昭和二十八年十月金沢文庫で録したものである筆者按：（「此爲於金澤稱名寺彙整經論書寫的熙允所遺留の手澤本，左方爲於昭和二十八年十月收録於金澤文庫之文。」）並有引文，今節録轉引如下：

新羅国有一沙弥，名曰元孝，神智恵□，能化衆生，說法無碍，所行難量，或俱時現所々高座，或異時処々設齋。爾時，唐国有王，名大宋（太宗）文皇帝，于時，大宋發願云：「我爲衆生欲作三身一体之觀音像，伝聞新羅国有一化身之沙弥，神通自在。今請彼人，欲問可造件菩薩之体。」故差使於新羅国，囑（屈）請彼沙弥。于時，新羅国王請件沙弥，述事由。沙弥語唐朝使云：「我詣唐国，而不可趣御願矣。何以故？

69 （日）小林智昭、小林保治、増古和子校注・訳者，《宇治拾遺物語》（東京：小學館株式會社，1989），卷6〈宝志和尚影の事〉。

我大師宝志和尚是觀音之化身也，即在長安市，化度衆生。夫（天）使早還，可奏其由。」即作消息之書，寄使乎呈大師。使乎還朝，具奏件事。于時，國王即出勅使，令持彼沙弥文書，俱市官共共求件和尚，曾不知在所。于時，有人申云：「年来市賤陋乞丐，夫聖人者和光同塵，暗蹟混俗，是故凡夫難知其變，恐若是人歟。」……敬陳禮拜曰：「願大和尚救度朕。」和尚答云：「不敢，罪過。」國王即陳上大願旨，和尚曰：「若然者得三人造工，令造三身一體之身。」國王歡喜歸蹕，差送三人好手仙師，和尚即以右大指之爪，從眉間至額裂開，令見仙師。一人見三目八臂不空羂索，其身一丈，魏々端正；一人見十一面觀音自在菩薩，一「桺」手半，相好円満；一人見千手千眼觀音，長六尺，放光明照耀。三人一見各図一体。于時，乞者亦忽不現。但其住所所在文書，尽解説円通之理也。禪門学人无不學習草，十四科是也。⁷⁰

與《宇治拾遺物語》最大的差異，是出現寶誌的弟子——新羅國沙彌元孝一新角色，以及將寶誌勾勒成一乞丐，其他情節則大同小異，如三位畫師所見所畫分別變成不空羂索觀音、十一面觀音自在菩薩、千手千眼觀音。

換言之，至少在八世紀，寶誌化身爲十一面觀音的說法，即傳入日本，而寶誌本身也成爲當時日本僧俗膜拜的對象，最知名的是京都西往寺有一尊平安時代（11世紀）的寶誌和尚立像，⁷¹且還進一步謂其得以化現成其他形象的觀音，包括聖觀音、不空羂索觀音、千手千眼觀音，這些是中土所未見的。其目的，除了強化寶誌的神異性外，應當也和聖觀音、不空羂索觀音、千手千眼觀音等信仰的宣傳有相當的關係。而中土最爲常見的是寶誌化現爲十二面觀音，日本也可見到，只是時代稍晚，已到了相當於中土的宋元之際，如一山一寧（1247-1317）述、了真等編《一山國師語錄》，即有〈寶誌和尚〉，云：「杖挑刀尺塵中走，善竊如何露腳手。良哉十二面觀音，生在鷹巢葬龍阜。」⁷²時代再晚一些的春屋

70 轉引自（日）牧田諦亮〈中國における民俗佛教成立の過程〉一文第2節〈寶誌和尚傳考〉註41。見牧田諦亮著作集編輯委員會，《牧田諦亮著作集》第4卷，頁207-263。

71 參見大阪市立美術館特別展「木×仏像（きとぶつぞう）——飛鳥仏から円空へ日本の木彫仏1000年」，http://www.osaka-art-museum.jp/sp_evt/kitobutsuzo（2017.8.13上網檢索）。其他有關日本十一面觀音相可參（日）山本勉，《佛像：日本佛像史講義》（東京：平凡社，2016）一書。

72 （日）一山一寧述，了真等編，《一山國師語錄》（《大正藏》第80冊No. 2553，東京

妙葩(1311-1388)述、周佐等編《智覺普明國師語錄》，該書卷五也有〈誌公和尚〉，云：「戲劇場中昨夢回，借他面具面門開。梁朝祚與塔婆等，彈指纔消應手來。寶刀皇尺龜毛拂，併把三朝付一枝。十二面中那箇正，毘婆尸佛不曾知。面門擘破誑梁王，寧怪鷹巢示此生。可惜西來活祖意，一齊埋沒作同坑。」⁷³看來，二者所歌詠的都是中土典型的寶誌和尚勞面示現十二面觀音相。

五、寶誌現「十二面」觀音的意義

十二面觀音從七世紀的慧沼時已有之，之後，除了作為寶誌的化身外，也還可見其他的情形，如活動於八世紀的飛錫，在他所撰的《念佛三昧寶王論》卷中「高聲念佛，面向西方門第」，說道：「如說癡人見觀世音有十一面，即設難云：『何不安十二面耶？』及隨其語，又設難云：『何不安十一面耶？』子欲將東難西，其義若此。」⁷⁴從此一設問，我們可以發現十一面或十二面觀音在當時是並存的，觀音有安十一面者，也有作十二面者，且也未言及寶誌。又活動於九世紀的慧然，在其所撰的《鎮州臨濟慧照禪師語錄》卷一也有：「麻谷到參，敷坐具問：『十二面觀音阿那面正？』師下繩床，一手收坐具，一手擲麻谷云：『十二面觀音向什麼處去也？』麻谷轉身擬坐繩床，師拈拄杖打，麻谷接却相捉入方丈。」⁷⁵在此，十二面觀音已成為禪師參禪的話頭，當是禪師們熟悉的菩薩形象。只是，相較於十一面觀音，十二面觀音在典籍文獻仍舊是較少的，且出現時，多數還是謂寶誌能化現為十二面觀音。

另外，在敦煌莫高窟出土的壁畫、絹畫中，除了有許多的十一面觀音外，也有十二面觀音，如法國吉美博物館收藏編號MG25486（附錄

大學「SAT大正新脩大藏經テキストデータベース2015版」）。

73 (日)春屋妙葩述，周佐等編，《智覺普明國師語錄》(《大正藏》第80冊No. 2560，東京大學「SAT大正新脩大藏經テキストデータベース2015版」)，卷5。

74 唐·飛錫撰，《念佛三昧寶王論》，卷中(CBETA, T47, no. 1967, p. 140, a12-15)。

75 唐·慧然撰，《鎮州臨濟慧照禪師語錄》，卷1(CBETA, T47, no. 1985, p. 504, a22-25)。

二)，即是一幅十二面觀音的絹畫，⁷⁶ 其有明確榜題作：「南无十二面觀音菩薩」，又有「叔釋門法律臨壇供奉大德沙門法員一心供養」、「女長支一心供養」，以及「清信弟子張保支□發心敬畫十二面觀音菩薩……顯德六年（959）……」⁷⁷ 等等的供養人題記。又《大正藏·圖像部》第 6 卷收錄有京都帝國大學久原文庫藏玄證本《應現觀音》圖，圖下方有題記：「十二面觀音二十四應現 一觀自在現，二寶光現，三寶樓閣現，……二十三金蓮花現，二十四金輪現……天下大元帥吳越國王錢俶（929-988，948-978 在位）印造。」⁷⁸ 此圖值得注意的，除了十二面觀音外，還有其謂十二面觀音有「二十四應現」，這顯然是因應十二面觀音而創造出來的應現，就如同前言提到因有三十三身現化而有十一面觀音。也就是說，十二面觀音或附屬於十一面觀音，但發展到十世紀，它應已有獨立的信仰論述體系，且似乎刻意與寶誌斲面化現的故事結合，以宣傳十二面觀音信仰，致令寶誌儼然成為十二面觀音的代名詞。

十二在古代的中土是有特別的意義，《左傳·哀公七年》就有說道：「周之王也，制禮上物，不過十二，以爲天之大數也。」⁷⁹ 十二作為「天之大數」的概念，此後也就深植人心，如《國語·周語》：「王將鑄無射，問律於伶州鳩，對曰：『律所以立均出度也。古之神瞽，考中聲而量之以制，度律均鍾，百官軌儀，紀之以三，平之以六，成於十二，天之道也。』」⁸⁰ 或漢董仲舒所撰的《春秋繁露》卷七〈官制象天〉也說：「求天數之微，莫若於人，人之身有四肢，每肢有三節，三四十二，十二節相

76 又 P.3958 被 The International Dunhuang Project: The Silk Road Online (<http://idp.bl.uk/>，2017.8.13 上網檢索) 擬名為「十一面觀音菩薩像」者，其構圖與上述幾乎一樣。

77 The International Dunhuang Project: The Silk Road Online, <http://idp.bl.uk/> (2017.8.13 上網檢索)，有彩圖，惟供養人題記文字不甚清楚，故另參考馬德，〈敦煌絹畫題記輯錄〉，《敦煌學輯刊》1996.1(1996.6): 136-147。

78 京都帝國大學久原文庫藏玄證本《應現觀音》圖，東京大學「大正新脩大藏經圖像部データベース：SAT 大正藏圖像 DB」，<http://dzkings.l.u-tokyo.ac.jp/SATi/images.php> (2017.8.13 上網檢索)。

79 周·左丘明傳，晉·杜預注，唐·孔穎達疏，《春秋左傳注疏》（臺北：藝文印書館，1993，影印阮元十三經注疏本），卷 58，頁 1009。

80 周·左丘明撰，徐元誥集解，《國語集解》（北京：中華書局，2002），卷 3〈周語下〉，頁 113。

持，而形體立矣。天有四時，每一時有三月，三四十二，十二月相受，而歲數終矣。官有四選，每一選有三人，三四十二，十二臣相參，而事治行矣。以此見天之數，人之形，官之制，相參相得也。人之與天多此類者，而皆微忽，不可不察也。」⁸¹ 魏泰約於元祐九年（1094）撰成的《東軒筆錄》，該書卷十五也記載了一則趣聞，云：「楊察侍郎謫信州，及召還，有士子十二人送於境上，臨別，察即席賦詩，皆用十二事，而引論精至，士子無能屬和者，其詩曰：『十二天之數，今宵席上盈。位如星占野，人若月分卿。醉極巫山側，聯吟嶰管清。他年爲舜牧，協力濟蒼生。』」⁸² 有十二人爲楊察送別，楊察即席賦詩，將天之大數運用於詩，用以恭維十二人，也令今宵座無虛席、圓滿如意。又據研究，十二在中土，往往泛指多數，有極限之意，如〈木蘭詩〉的「軍書十二卷」、「策勳十二轉」、「同行十二年」等。⁸³ 故十二面觀音的「十二」，不論是實指，還是泛指，它有了獨立的論述體系，應當就是爲了讓十一面觀音能更進一步符合中土人們的數字觀。

又十三世紀日本東寺觀智院亮禪與寶蓮華寺亮尊合著的《白寶口抄》，卷五十九有云：「十一面與十二面造像圖繪不同也。若依十二面說文，是表十地、等覺、妙覺之十二地也。又表斷十二品無明，又十二面表利益十二因緣，或顯十二月、十二時等加護也。」此一說解，以爲十二面表十二地、斷十二品無明、利益十二因緣，或顯十二月、十二時等之保佑、保護，已較慧沼的「度十二因緣舉十二觀面」更爲詳盡，且將十一面與十二面明確區分開來。而南朝梁慧皎（497-554）《高僧傳》卷十〈梁京師釋保誌〉正好敘及十二時，云：「上嘗問誌云：『弟子煩惑未除，何以治之？』答云：『十二。』識者以爲十二因緣治惑藥也。又問十二之旨，答云：『旨在書字時節刻漏中。』識者以爲書之在十二時中。」⁸⁴ 這或許就是十二面觀音的信仰者，會借寶誌楞面示現以宣揚十二面觀音的其

81 漢·董仲舒撰，賴炎元註釋，《春秋繁露》（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7），卷7〈官制象天〉，頁196。

82 宋·魏泰撰，《東軒筆錄》（北京：中華書局，1983），頁169。

83 葉舒憲、田大憲，《中國古代神秘數字》（西安：陝西人民出版社，2010），頁228。

84 南朝梁·慧皎撰，湯用彤校注，《高僧傳》，卷10〈釋保誌〉，頁396。

中一項原因——十二面用以加護十二時。于君方謂寶誌及僧伽「有助於十一面觀音這位外來神祇的本土化」，⁸⁵而後來十二面觀音的出現與獨立發展，並與寶誌結合，則可說是讓十一面觀音更進一步地中土化。

六、結 論

透過前文的討論，我們可以知道，敦煌文獻中與寶誌有關的寫本、壁畫，基本上有二種類型：一種是S.1624、P.3727、S.5600，敘述寶誌楞面示現觀音相令僧繇無以作畫的故事；另一種則是S.3177、P.3641及莫高窟第395窟甬道南壁有寶誌像，它們均書寫有〈梁武帝問志公和尚如何修道〉。而S.1624應是天福七年（942）前後抄寫的，又敦煌寫本的抄寫最晚也不會晚於1002年，加上莫高窟第395窟甬道南壁的寶誌和尚像，為曹氏歸義軍前期（10世紀前期）所畫，故整體來看，它們反映的應該是十世紀的文化現象。

而綜觀各式典籍文獻有關寶誌和尚楞面示現觀音相令僧繇無以作畫的記載，我們也發現它一如顧頡剛所言的中國上古史及神話譜系化的形成過程存在著「層累地造成」規律。南朝時，僅言寶誌化現為菩薩，並未言明是觀音菩薩；八至九世紀初始言化現為觀音，且應該在此時就出現了藉楞面示現觀音相令僧繇無以作畫的生動故事；九世紀中葉才出現有寶誌是十一面觀音的化身；十世紀上半葉又有十二面觀音之說；十一世紀開始，提到寶誌和尚示現觀音相都是十二面，不再出現十一面，寶誌儼然成為十二面觀音的代名詞。

至於日本，至晚在八世紀，寶誌化身為十一面觀音的說法，即傳入日本，而寶誌本身也成為當時日本僧俗膜拜的對象，且還進一步謂其得以化現成其他形象的觀音，包括聖觀音、不空羂索觀音、千手千眼觀音，這些是中土所未見的。它的目的應當是為強化寶誌的神異性，以利十一面觀音信仰的宣傳，同時，或也和聖觀音、不空羂索觀音、千手千眼觀音等信仰有相當的關係。而中土最為常見的寶誌化現為十二面觀

85 于君方，《觀音——菩薩中國化的演變》，頁22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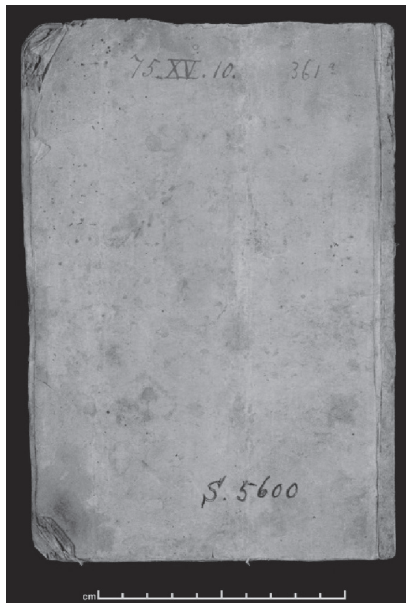
音，日本也可見到，只是時代稍晚，要到中土的宋元之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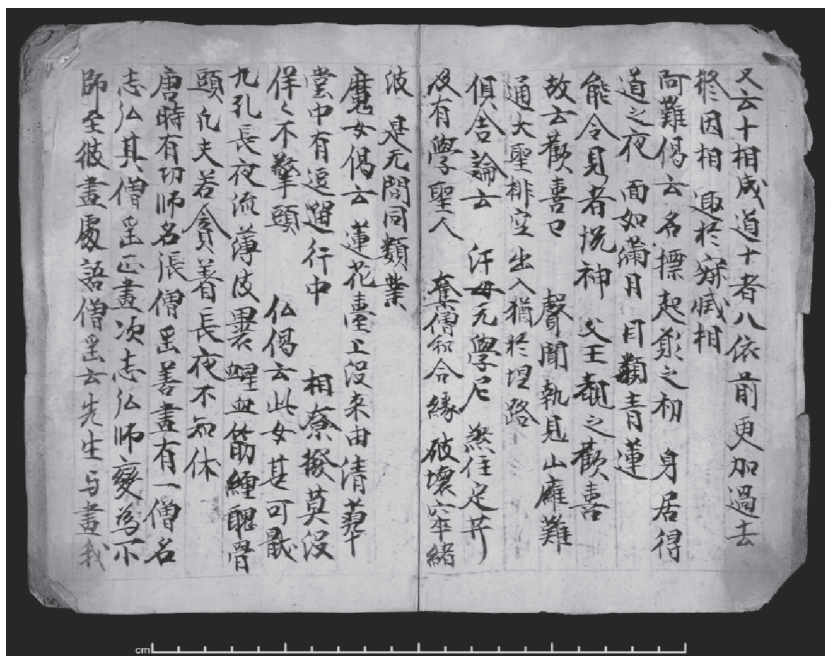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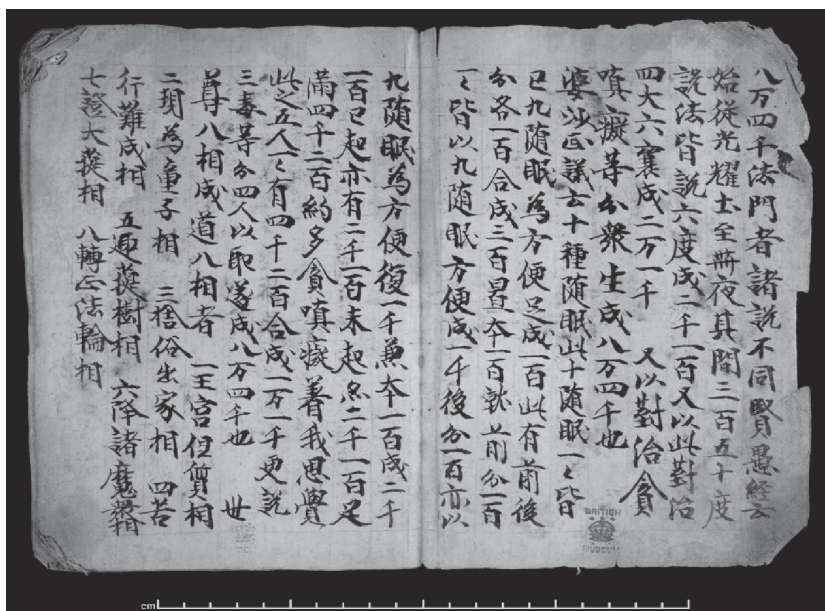
十世紀上半葉出現寶誌化現十二面觀音之後，到十一世紀，十二面觀音在寶誌化現的故事裡已完全取代了十一面觀音。顯然十二面觀音一開始或附屬於十一面觀音，但發展到十世紀，它應已有獨立的信仰論述體系，且刻意與寶誌勞面化現的故事結合，用以宣傳十二面觀音信仰。這可透過《大正新修大藏經·圖像部》第6卷收錄的京都帝國大學久原文庫藏玄證本《應現觀音》圖的「十二面觀音二十四應現一觀自在現，二寶光現，三寶樓閣現，……二十三金蓮花現，二十四金輪現……天下大元帥吳越國王錢俶印造」之題記作為印證。又法國吉美博物館藏編號MG25486一幅出自敦煌莫高窟的顯德六年（959）觀音相絹畫榜題也作：「南无十二面觀音菩薩」。而從十一面變為十二面，當與十二在中土被視為「天之大數」的數字觀有關，令十一面觀音更進一步中土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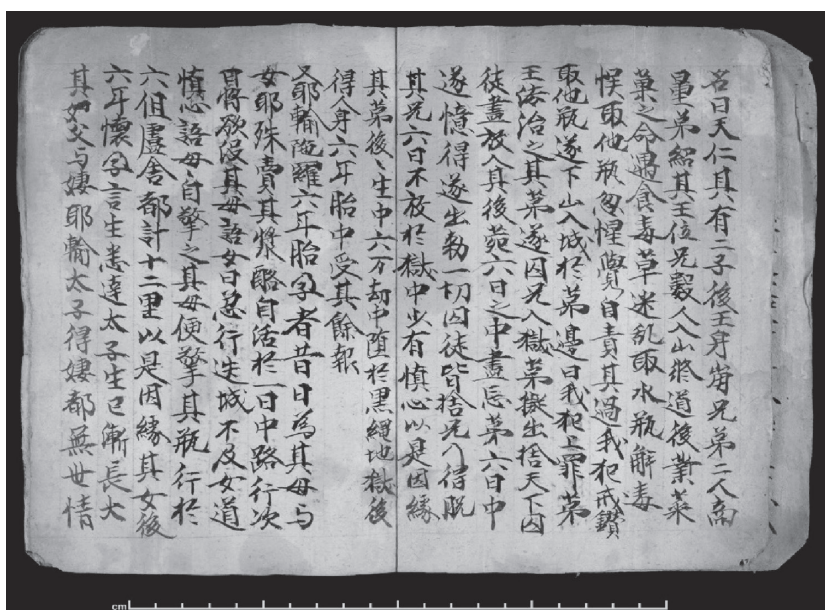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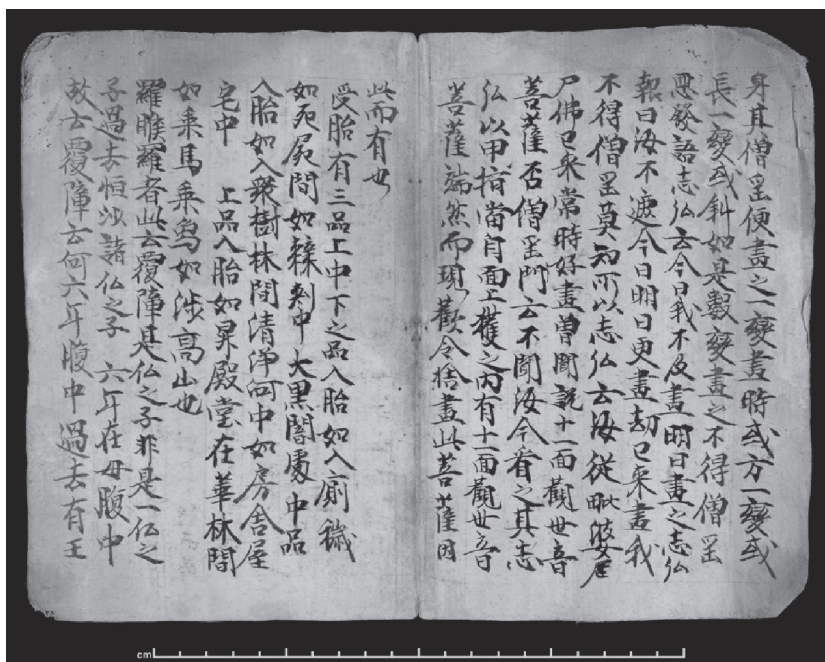
附 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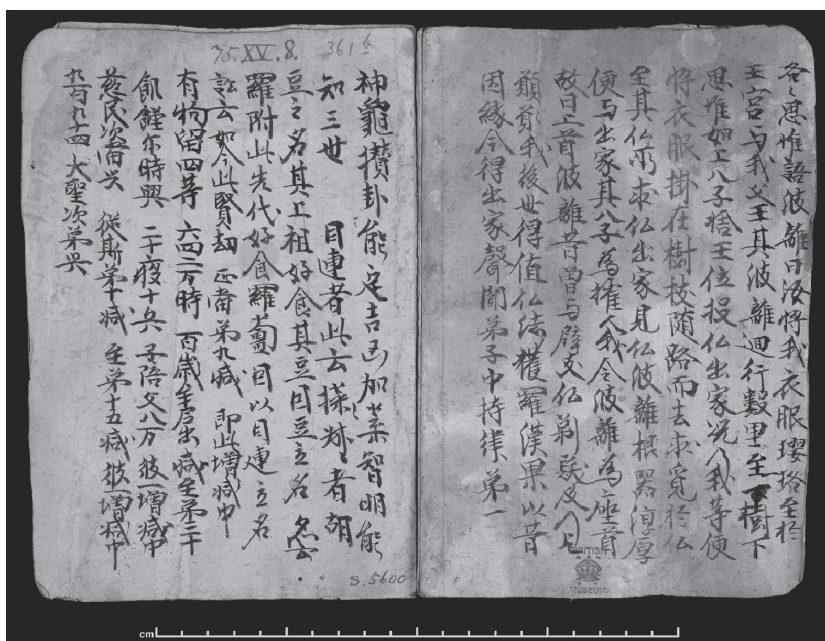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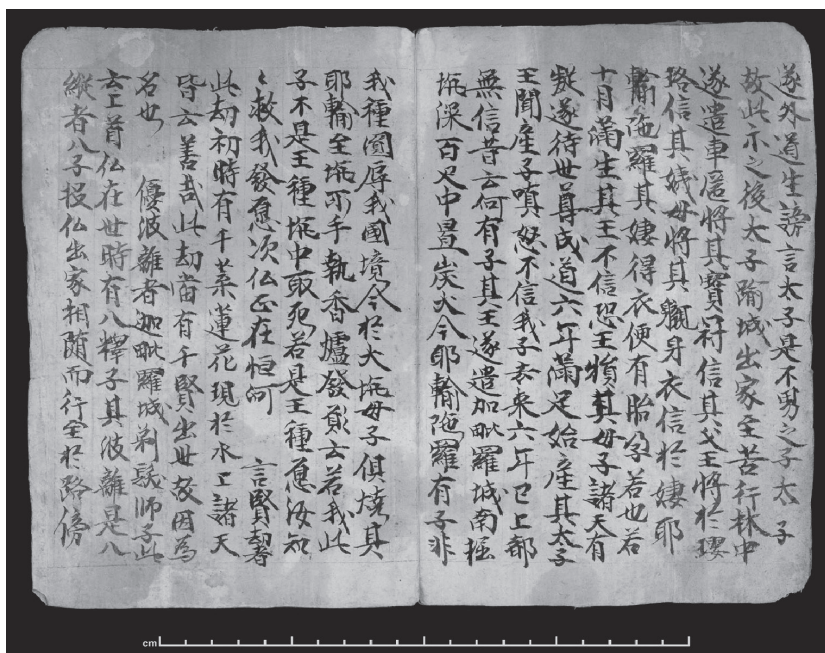
國際敦煌項目（International DunHuang Project）資料庫所收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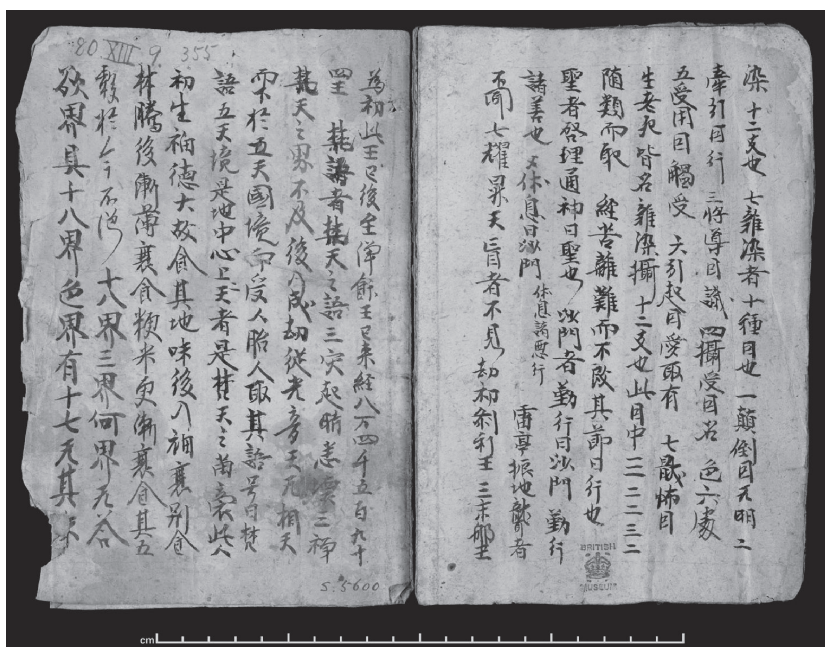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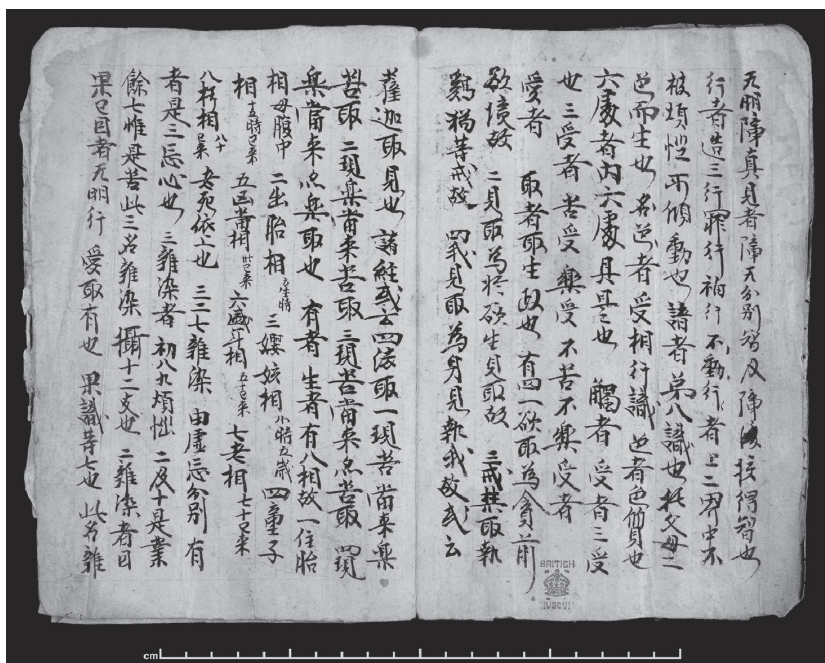
「一、S.5600佛教人事雜抄」（擬）（<http://idp.bl.uk/>）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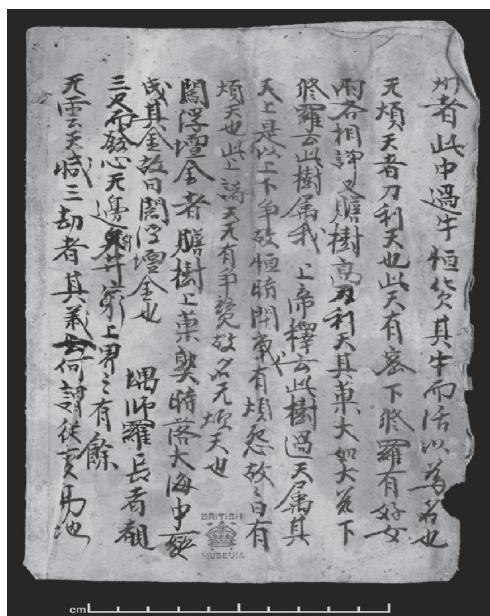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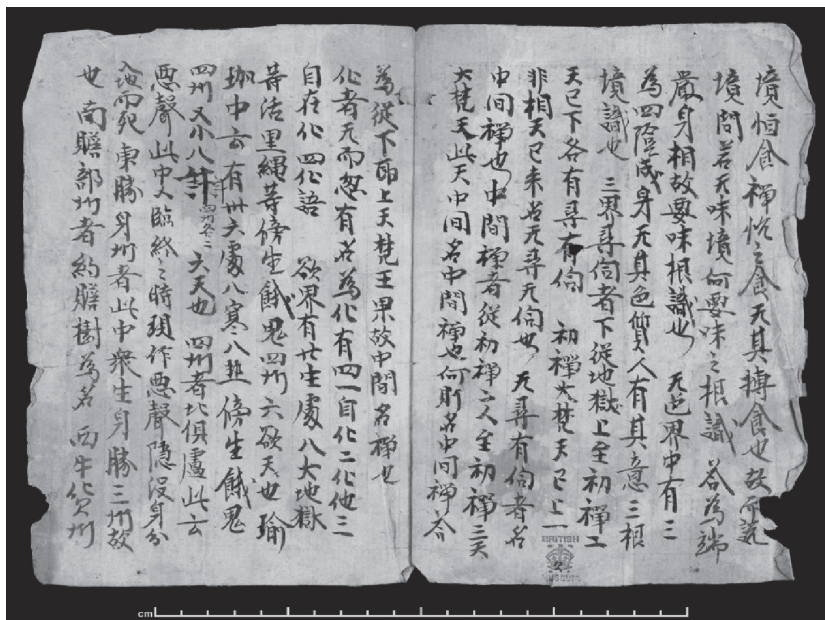












二、法國吉美博物館收藏編號MG25486 (<http://idp.bl.uk/>)



引用書目

一、傳統文獻

周·左丘明傳，晉·杜預注，唐·孔穎達疏，《春秋左傳注疏》，臺北：藝文印書館，1993，影印阮元十三經注疏本。

周·左丘明撰，徐元誥集解，《國語集解》，北京：中華書局，2002。

漢·董仲舒撰，賴炎元註釋，《春秋繁露》，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7。

北周·耶舍崛多譯，《佛說十一面觀世音神咒經》，《大正藏》第20冊 No. 1070，

CBETA電子佛典集成2016。

南朝梁·慧皎撰，湯用彤校注，《高僧傳》，北京：中華書局，1997。

隋·智顗撰，《妙法蓮華經文句》，《大正藏》第34冊 No. 1718，CBETA電子佛典集成2016。

唐·元稹撰，《元稹集》，北京：中華書局，2000。

唐·寒山撰，項楚注，《寒山詩注》，北京：中華書局，2000。

唐·窺基撰，《阿彌陀經疏》，《大正藏》第37冊 No.1757，CBETA電子佛典集成2016。

唐·窺基撰，《阿彌陀經通贊疏》，《大正藏》第37冊 No. 1758，CBETA電子佛典集成2016。

唐·玄奘譯，《阿毘達磨俱舍論》，《大正藏》第29冊 No. 1558，CBETA電子佛典集成2016。

唐·飛錫撰，《念佛三昧寶王論》，《大正藏》第47冊 No. 1967，CBETA電子佛典集成2016。

唐·栖復集，《法華經玄贊要集》，《新續藏》第34冊 No. 0638，CBETA電子佛典集成2016。

唐·神清撰，宋·慧寶注，《北山錄》，《大正藏》第52冊 No. 2113，CBETA電子佛典集成2016。

唐·道宣撰，《集神州三寶感通錄》，《大正藏》第52冊 No. 2106，CBETA電子佛典集成2016。

唐·慧沼撰，《十一面神咒心經義疏》，《大正藏》第39冊 No. 1802，CBETA電子佛典集成2016。

唐·慧然撰，《鎮州臨濟慧照禪師語錄》，《大正藏》第47冊 No. 1985，CBETA電子佛典集成2016。

唐·歐陽詢撰，《藝文類聚》，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

宋·子瑋撰，《首楞嚴義疏注經》，《大正藏》第39冊 No. 1799，CBETA電子佛典集成2016。

宋·本覺編，《釋氏通鑑》，《新續藏》第76冊 No. 1516，CBETA電子佛典集成2016。

宋·志磐撰，《佛祖統紀》，《大正藏》第49冊 No. 2035，CBETA電子佛典集成2016。

宋·李昉等奉勅編，《文苑英華》，北京：中華書局，1966。

宋·施宿撰，《（嘉泰）會稽志》，清文淵閣四庫全書本，「中國基本古籍庫」。

宋·祖琇撰，《隆興編年通論》，《新續藏》第75冊 No. 1512，CBETA電子佛典集

成2016。

宋·紹隆等編，《圓悟佛果禪師語錄》，《大正藏》第47冊 No. 1997，CBETA電子佛典集成2016。

宋·郭若虛撰，《圖畫見聞志》，明津逮秘書本，「中國基本古籍庫」。

宋·黃庭堅撰，宋·史容注，《山谷外集詩注》，四部叢刊景元刊本，「中國基本古籍庫」。

宋·黃芑，《山谷年譜》，清文淵閣四庫全書本，「中國基本古籍庫」。

宋·惠洪撰，《石門文字禪》，四部叢刊景明徑山寺本，「中國基本古籍庫」。

宋·智圓撰，《阿彌陀經疏》，《大正藏》第37冊 No. 1757，CBETA電子佛典集成2016。

宋·劉道醇撰，《宋朝名畫評》，清文淵閣四庫全書本，「中國基本古籍庫」。

宋·魏泰撰，《東軒筆錄》，北京：中華書局，1983。

宋·贊寧撰，《宋高僧傳》，北京：中華書局，1997。

清·董皓等編，《全唐文》，北京：中華書局，1987。

(日)一山一寧述，了真等編，《一山國師語錄》，《大正藏》第80冊 No. 2553，東京大學「SAT大正新脩大藏經テキストデータベース2015版」。

(日)小林智昭、小林保治、増古和子校注・訳者，《宇治拾遺物語》，東京：小學館株式會社，1989。

(日)安然撰，《諸阿闍梨真言密教部類總錄》，《大正藏》第55冊 No.2176，CBETA電子佛典集成2016。

(日)成尋撰，王麗萍校點，《新校參天台五台山記》，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

(日)春屋妙葩述，周佐等編，《智覺普明國師語錄》，《大正藏》第80冊 No.2560，東京大學「SAT大正新脩大藏經テキストデータベース2015版」。

(日)惠運撰，《惠運律師書目錄》，《大正藏》第55冊 No. 2168B，CBETA電子佛典集成2016。

(日)惠運撰，《惠運禪師將來教法目錄》，《大正藏》第55冊 No. 2168A，CBETA電子佛典集成2016。

(日)圓仁撰，《入唐新求聖教目錄》，《大正藏》第55冊 No. 2167，CBETA電子佛典集成2016。

(日)圓仁撰，白化文、李鼎霞、許德楠校注，《入唐求法巡禮行記校注》，石家莊：花山文藝出版社，2007。

(日)圓珍撰，《日本比丘圓珍入唐求法目錄》，《大正藏》第55冊 No. 2172，CBETA電子佛典集成2016。

- (日)圓珍撰，《智證大師請來目錄》，《大正藏》第55冊 No.2173，CBETA電子佛典集成2016。
- 大阪市立美術館特別展「木x仏像（きとぶつぞう）——飛鳥仏から円空へ日本の木彫仏1000年」，http://www.osaka-art-museum.jp/sp_evt/kitobutsuzo（2017.8.13上網檢索）。
- 京都帝國大學久原文庫藏玄證本《應現觀音》圖，東京大學「大正新脩大藏經圖像部データベース：SAT大正藏圖像DB」，<http://dzkings.l.u-tokyo.ac.jp/SATi/images.php>（2017.8.13上網檢索）。
- Museum of Fine Arts, Boston, <http://www.mfa.org/collections/object/lohan-manifesting-himself-as-an-eleven-headed-guanyin-24230>（2017.8.13上網檢索）。
- The International Dunhuang Project: The Silk Road Online, <http://idp.bl.uk/>（2017.8.13上網檢索）。

二、近人論著

- (日)山本勉 2016 《佛像：日本佛像史講義》，東京：平凡社。
- 于君方 2012 《觀音——菩薩中國化的演變》，北京：商務印書館。
- 朱金城 1991 《白居易年譜》，臺北：文史哲出版社。
- (法)伯希和(Paul Pelliot)著，耿昇譯 2007 《伯希和敦煌石窟筆記》，蘭州：甘肅人民出版社。
- (俄)孟列夫主編，袁席箴、陳華平譯 1999 《俄藏敦煌漢文寫卷敘錄》，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 (日)松本信道 1987 〈『延曆僧錄』戒明傳の史料的特質〉，《駒沢史學》37(1987.11): 31-46。
- (日)松本信道 2006 〈寶誌像の日本傳播(一)：大安寺を中心として〉，《駒澤大學文學部研究紀要》64(2006.3): 27-45。
- (日)松本信道 2007 〈寶誌像の日本傳播(二)：天台入唐・入宋僧を中心として〉，《駒澤大學文學部研究紀要》65(2007.3): 1-12。
- 昌彼得 1997 《增訂蟬菴羣書題識》，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
- 牧田諦亮著作集編輯委員會 2015 《牧田諦亮著作集》，京都：臨川書店。
- 郝春文、趙貞編著 2010 《英藏敦煌社會歷史文獻釋錄》第7卷，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 張小剛 2015 《敦煌佛教感通畫研究》，蘭州：甘肅教育出版社。
- 馬 德 1996 〈敦煌絹畫題記輯錄〉，《敦煌學輯刊》1996.1(1996.6): 136-147。

- 葉舒憲、田大憲 2010 《中國古代神秘數字》，西安：陝西人民出版社。
- 鍾書林、張磊 2014 《敦煌文研究與校注》，武漢：武漢大學出版社。
- 顧頡剛 1982 《古史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 方廣錫 2014 〈敦煌遺書中寫本的特異性——寫本學筭記〉，《敦煌吐魯番研究》14(2014.12): 181-192。
- 何劍平 2003 〈張僧繇為寶志作畫事蹟之考釋〉，《華林》第3卷，北京：中華書局，頁193-204。
- 李 靜 2006 〈寶誌十一面觀音信仰與相關故事產生時間新議〉，《新國學》2006(2006.11): 89-107。
- 崔小敬 2004 〈南朝僧寶誌考略〉，《覺群學術論文集》第3輯，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頁193-204。
- 楊明璋 2017 〈泗州僧伽和尚神異傳說研究——以敦煌文獻為中心的討論〉，《中國學術年刊》39(春季號，2017.3): 51-76。

Mysterious Legends of the Monk Baozhi in the Tang and Song Dynasties and the Worship of Eleven- and Twelve-Headed Guanyin in China and Japan

Yang Ming-chang*

Abstract

Dunhuang manuscripts and frescos relating to the Buddhist monk Baozhi 寶誌 can be divided into two types : those in the first category relate to the story of Baozhi tearing open his face to reveal the divine face of Guanyin, as described in S.1624, P.3727, S.5600 ; the other category contains depictions of Baozhi in S.3177, P.3641 and on the south wall of the corridor of Mogao cave 莫高窟 no. 395. All these depictions feature the description “梁武帝問志公和尚如何修道” (Emperor Wu of Liang asks the monk Zhigong [Baozhi] how to practice the Dharma), and likely reflect the culture of religious belief in tenth-century Dunhuang.

This article also comprehensively surveys ancient Chinese and Japanese books and documents relating to the legend of Baozhi ripping open his face. It identifies a phenomenon in these texts described by Gu Jiegang as “cumulative creation” 層累地造成.

Twelve-headed Guanyin was probably related to Eleven-headed Guanyin originally, but by the tenth century had already developed its own independent belief system, and had been purposely integrated with the story of Baozhi tearing open his face to reveal Guanyin beneath.

Keywords: Baozhi 寶誌, legends, Dunhuang 敦煌, eleven-headed, twelve-headed, Guanyin

* Yang Ming-chang is associate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Chinese Literature,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